

第 一 章

帝国时期概述

巴西社会——文学和艺术的影响——教士及政教之争——巴西的经济地理——经济周期——废除奴隶制和奴隶经济——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帝国的财政金融政策——极端中央集权制

帝国临终时期的巴西社会，自然要反映出国家的一般经济状况，而这种状况又决定于奴隶劳动所促成的、乡村大面积私人占有土地的粗放耕作制。因此，当时的巴西社会结构很简单。基本上只有两个阶级：上面是社会名流，由种植园主、知识分子和有爵位的贵族组成，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依靠广阔土地的恩赐过活；下面是卑贱的奴隶和佃农群众，他们被许多有势力的农业大家族奴役着。

处于萌芽状态、由商人和从事专门职业的人组成的城市阶级 其影响仍然微不足道。有一点工业，也无非是属于家庭工业的类型。北方是自给自足的制糖作坊，南方是大农场（Fazendas），这种体制妨碍了乡村地区小资产阶级的发展，也阻碍了商品和服务性劳动的广泛交换。因此，对通货的需求，便保持在最低限度。

巴西当时是个没有小市镇和村庄的国度，这种情况比今天更为明显。然而 自有其古朴的优点和无数缺点 其中如 宗族观念、极端地墨守传统以及死板的清规戒律等 的乡村文化 却比城市文化还占优势，纵然这些城市更容易受到那种正在使西方发生革命的机械工艺的影响。几十万移民，在帝国临近结束的年代，到圣保罗的一些大农场定居下来，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巴西人生活当中那种传统的慷慨、热情与友好的气氛。不讲卫生、缺少公共设施 又时常为流行病所侵袭的城市 只不过是一些广大而丑陋的村落罢了。务农的大家庭，都宁愿在他们的大庄园里居住 因为在那里 他们能够以较低的费用过着更为充裕的生活，而且完整无缺地保持他们的权力和社会威望。古老的北

方大城市——贝伦、累西腓和巴伊亚（萨尔瓦多）差不多是自治的文化中心。里约热内卢的四、五十万居民，散布在后来称为联邦区的广大区域里，它尽管是首都，但却不是全国的社会中心。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和南里约格朗德等省的人口不大稠密的城市中心，就更不重要了。

佩德罗二世处事拘谨和生活节俭的习惯，表现在他对物质享受抱着一种摈弃的态度。第二王朝的朴实无华，以里约城、圣克里斯托旺及皮特罗普利斯等皇宫内不甚考究的生活方式为其象征。这些地方，舒适和便利的生活设备之缺，是举世皆知的。在北方，富裕的巴西人去过欧洲而未游历过里约城，是很普通的事情。拿当时的时代来说，私人招待会已成为上流社会的一种排场，然而在里约城能够找到的客厅，却寥寥无几。拉马略·奥尔蒂冈在帝国临终时访问巴西以后，给爱德华多·普拉多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若干年前曾在圣保罗的一家杂志上发表），他在信中哀叹说：这个国家的首都，连让太太小姐们炫耀长袍的沙龙都没有。他又诙谐地补充说：他的一位女友曾经告诉他，在里约城，仅有两位女士能够“领导一个提倡

风雅的运动”，一位已经逝世，而另一位则已迁往欧洲。

佩德罗二世密切地注视着公众的道德风尚。他对于在廉洁正直方面可疑的人，怀有本能的嫌恶，并且不肯原谅那些不适当或者不正派的行为。他那支著名的“决定命运的铅笔”是供他圈点可疑者的姓名用的，它确实能够引起人们的惊恐。他私人生活中的高尚品德，对他那些政治和行政僚属来说，就是一个榜样，甚至是一种针砭。那时候，金钱还没有成为衡量价值的通用标准。绝大多数的公务人员都是诚实的模范。而且，这个正直传统十分强固，所以一直延续到共和国时代，甚至在“恩西利亚门托”时期（这是一个通货膨胀引起暴富和破产的时期，人们普遍地把它归罪于1890年共和国第一任财政部长鲁伊·巴尔博扎所公布的金融政策）也经受住了到证券交易所去搞投机活动的巨大诱惑。

巴西知识界的一般思想倾向，必然是蹈常袭故、千篇一律的。盛行一时的形式主义甚至影响到了日常服装，所以无助于知识界的思想奔放。佩德罗二世的书卷气、他对古典文学和外邦学问例

如国内知识分子不感兴趣的梵文和阿拉伯文)的着迷,都自然要对他王国里的重要人物发生若干影响。

到十九世纪初期为止,巴西的文化艺术生活,一直都是葡萄牙(那种本来就很贫乏的)文化艺术生活的反映,并且很少受到外界影响的触动。浪漫主义在巴西的兴起(以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斯的平庸诗歌为其前奏),标志着独立的巴西文学的开端。其后不久,因为从夏托布里昂和费尼莫尔·库珀^②等人已经有点过时的作品中得到了启示,巴西的民族浪漫主义便同若泽·德·阿伦卡尔及贡萨尔维斯·迪亚斯的印第安主义合为一体了。这种多少有些矫揉造作的形式(尤其是阿伦卡尔所运用的那种),从爱国的角度颂扬了巴西的原始居民,或者在无意之中反抗了葡萄牙文化的

① 夏托布里昂(Chateaubriand, 1768—1848年)法国作家。——译者

费尼莫尔·库珀(Fenimore Cooper, 1789—1851年),美国小说家。——译者

长期束缚，它在拜伦、维克多·雨果以及社会诗歌的影响之下，又发生了变化。巴西的两位伟大诗人：卡斯特罗·阿尔维斯和阿尔瓦雷斯·德·阿泽维多^④是这些思潮的最高代表。等到这些思潮过时之后，现实主义和高蹈主义^⑤便占据了显著地位。

随着共和国的日益临近，巴西文学也进入了一个最光辉灿烂的时期。文学家们虽然自认为是反对浪漫主义的，但却洋洋得意地培育着1830年巴黎的那种放荡不羁的老传统。可是，到了最后，

拜伦 (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年), 英国诗人。——译者

维克多·雨果 (Victor Hugo, 1802—1885年), 法国戏剧家和小说家。——译者

安东尼奥·德·卡斯特罗·阿尔维斯 (Castro Alves, 1847—1871年), 巴西诗人和剧作家。他在一场打猎的意外事故中，不幸身死，当时虽然只有24岁，但是他的著作，却对巴西的诗歌发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英译者

曼努埃尔·安东尼奥·阿尔瓦雷斯·德·阿泽维多 (Alvares de Azevedo, 1831—1852年), 巴西诗人和短篇小说家。只是在他20岁患肺病逝世后，他的诗歌和小说才发表，人们公认他是巴西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英译者

高蹈主义，为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诗坛中的一种主张，重技巧而不重情感。——译者

他们在那些关于“人性记录”^①的写实小说和那些冷静而客观的高蹈派诗歌当中，便也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远远脱离了本民族的生活。

马查多·德·阿西斯设法摆脱了这些昙花一现的法国影响。他那英国式的幽默、非凡的心理洞察力以及文体上的艺术技巧，使他得以独具一格。他的青年时代，浪漫主义还在流行。那时他喜欢写一些有关宫廷贵族生活的短篇社会小说（从中很难发现有什么地方暗示着他将成为未来的大师），不过，由于他为人质朴、羞怯，恐怕他对于这种生活，是不会有太多亲身体验的吧。到了他的成熟时期，即当他才情焕发，精神上亟需解脱长期愤懑的时候，他那些长篇小说和短篇幽默小说里的人物，就变成了人间的弱点、荒唐无稽和诸多琐细的痛苦不幸的表象了，尽管它们在本质上带有普遍性，但却仍然是根植于巴西，尤其是里约热内卢的土壤里。

法国对巴西艺术的影响，同她对巴西文学的

^① “人性记录”（Human document）意为记录活生生的事实，用以表现人性的真实面目。——译者

影响是一样大的。在经历了早期限于模仿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而且多少有些虚矫华丽、装饰恶俗的“原始”阶段之后，巴西的画家和雕塑家几乎专一地汲取了法国人的情感和技巧。在帝国末期，一种民族主义的倒退倾向开始了，它主张在描绘巴西生活方面，采用较为自由的表现手法。在音乐方面，法国和意大利的影响大致相等。在宗教的和民用的建筑方面，古老的葡萄牙殖民地传统形式影响最大。

当时正在流传的一些从世纪中叶起就不断革新欧洲思潮的哲学学说，使巴西文化开始有了它自己的同一性。孔德 和斯宾塞 的哲学，即使还没有很好地消化吸收，也已经对学术界、政界和军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了。在帝国临终的年代里，政论文引起了诸如若阿金·纳布科和鲁伊·巴尔博扎等杰出人士的兴趣。这两个人都热心地赞美英国的典章制度，不过纳布科所受的文化教育，却几乎

孔 德 (Auguste Comte, 1798—1857 年)，法国哲学家。——译者

斯 宾 塞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年)，英国哲学家。——译者

完全是法国的。

政治界和知识界名流当中的老一辈代表人物，也都满怀兴致，或者至少是带着天真的虚荣心，效法起英国议会里的辩论来了。他们的知识教养基本上是属于古典的，但也来自科英布拉大学古老的风尚，来自累西腓和圣保罗的法学院，来自法典和帝国的法学家。民法不过是对未来的许愿——顺便提一下，许的这个愿是直到共和国胜利以后又过了二十七年，方才实现的。

报界已经失去了摄政时期的那种激烈情绪，而或多或少地宁愿使自己适应于帝国的和平气氛。那时候还不懂得什么叫煽动公众的感情，甚至是最有名气和最为生动活泼的报纸，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也要显得枯燥乏味，版式拙劣。新闻记者，在一种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发挥其职能作用，这就鼓舞了象埃瓦里斯托·达·维加和儒斯蒂尼亚诺·若泽·达·罗沙这样一些空谈理论的人。在一个精神生活十分贫乏，又没有书籍或文化刊物予以激励的国家里，报纸便成了传播思想的最

① 科英布拉 (Coimbra)：葡萄牙城市。——译者

好媒介。在报纸的荫庇之下，文人在探索着他们自己的道路。阿普尔克罗·德·卡斯特罗遭到恶意谋杀而谋杀者未受惩办一事，也许把讽刺作家们吓破了胆。老一代的政论小册子的作者们，如著名的《民众的讽刺》一书的作者萨莱斯·托雷斯—奥门，到头来就在政府的参事会里获得了职位。

《商业日报》^①在其著名的‘特约稿件’栏里，发表有报酬的文章，开展了当代的重大政治辩论；同这类文章比肩并立的，是些私人的论战、各式各样的抨击、无聊的诽谤、琐细的牢骚以及一个乡土习气很深的城市所特有的那种矫揉造作的祝辞、贺帖。主要的报纸夸耀它们的政治中立，而那些与轮流执政的党派之中的某个党派有密切联系的报纸，便只有在它们相互斗争的时候，才能够有销路。临近帝国终期，反对派报纸的呼声就愈发响亮了。若泽·多·帕特罗西尼奥关于废除奴隶制的激昂慷慨的游说，以及鲁伊·巴尔博扎在《新闻日报》与《祖国报》上发表的强有力的文章都清楚地显示了新的战斗精神。

现今仍然是里约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而且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也许是最有价值的。——英译者

教会，在帝国时期没有成为一股有很大影响的社会势力，部分原因是教会的忠仆们品德和智力平庸，而主要地是因为它对国家处于从属的地位——这种情况，与佩德罗二世那种帝王对教会政治掌握绝对权力的严格主张，是完全符合的。巴西教会未曾有过那种使法国教士受到鼓舞的长期斗争的光辉传统，而这种传统，使得法国教士们心灵上的美德和品格，在革命时期和拿破仑专政时期，得到了加强。与此相反，巴西教会却效法了葡萄牙教会的榜样。因为它和帝国的官僚政治融合在一起，所以教士们受不到外界的激励来完成他们的使命。

大多数统治阶级所遵奉的天主教教义，都和皇帝所信奉的一样，即：虔诚的自然神论，一种无精打采、拘泥外表的宗教仪式，以及一种永久性的恐惧，害怕被别人当成是教皇至上主义者，或庇护九世那套异教谬论的拥护者。在私人家庭生活中，宗教的崇拜，具有一种诗意的和传统的形式，而在许多方面，都和罗马人对家庭守护神的崇拜

① 庇护九世 (Pius IX) , 1846—1878 年间的罗马教皇。——译者

相似。在广大的群众（其中大部分是奴隶和奴隶的后裔）里边，宗教崇拜很自然地带着一些令人想起非洲拜物教的活生生的痕迹。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纪律和风俗很容易变得松弛。教士与人姘居，轻易地就受到了宽恕，在乡村地区，尤其如此。教士集团里的一些成员，其中包括领导过重大政治斗争，或者作为政治首领而受到敬畏的人物，也都毫不在意地夸耀他们的私生子。在一个有官方宗教而禁止共济会秘密结社的国家里，竟不单是政治家，而且连天主教的教士们都是共济会会员。巴西关于见习修道士的禁令，当时正在迅速地消灭着修士会，它们的大量教堂财产，从而就变成了公共的产业。

维塔尔·德·奥利维拉阁下 不到三十岁 便得到了乌林德（一度是伯南布哥省的首府）主教的职位 他在1872年，决定发起一个宣扬道德和严明纪律的整肃运动。他精力充沛、斗志旺盛，有点象个年轻的拉姆内^①。他禁止其管区的教士去参加共济会会员举行的仪式。他按照他自己的逻辑，并

拉姆内（Lamennais, 1782—1854年）法国天主教教士，资产阶级宗教和政治问题的作家，曾受教皇谴责。——译者

凭借着巴拉省主教安东尼奥·德·马塞多·科斯塔阁下的支持 竟然采取了更进一步的措施 强迫天主教教友会公开放弃它们立下的共济会誓言。不服从他的时候，他便下令将教友会和教堂的职权一并停止。这样一来 教会和政府之间就发生了冲突 因为没有政府的明文批准 便不可能改变民法，而教友会是按照民法组织起来的。

共济会的主要首领里奥·布兰科子爵所主持的内阁 并不打算同这两位主教妥协。当他们拒绝撤销该项停止职权的命令时，政府便在国务委员会的支持下 把他们传到法庭上审讯。他们被判了四年苦役，只不过将该项刑罚改为单纯的监禁。

一年半之后 当卡夏斯公爵出任首相时 他们受到政府的特赦。但是君主国和教会之间的严重纠纷（尽管与世俗政权有过几个世纪外交来往的罗马教廷甘心把它忘掉）却使巴西教士们的愤懑久久未能磨灭。这帮教士即使没有走得太远 以至于公开依附共和主义运动，他们至少也是对帝国的命运失去了兴趣。

然而，我们需要分析的主要是帝国的经济生活 因为帝国崩溃的主要原因 毫无疑问应该从这

方面去寻找。

在巴西刚被发现的时候，它的土著居民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社会结构极为原始。因此，葡萄牙人在他们这块新的庞大殖民地里，并没有象他们过去在东印度群岛那样，遇到当地土著文化的抵抗，甚至也没有象西班牙人那样，在墨西哥遭到阿兹台克族、在秘鲁遭到印加族文化的抵抗。在巴西，他们向所发现的土著居民，灌输了典型的葡萄牙文化。当然，不久以后从非洲运来的黑人和土著印第安人，也强有力地影响了巴西平民的普通的，或者用句老话来说，不大光彩的生活面貌。这里所说的平民都是由这三个种族通过家庭生活上的密切接触实现异族通婚而生育的后代。这些人破坏了葡萄牙殖民者那些已经衰退的优良品德，而给了他们另外的一些品德，影响了他们的语言，也改变了他们的宗教活动。但是，比较优秀的分子所带进来的道德上和政治组织上的根本基础，却完整地保留下来。这里附带说一句，在殖民地的大发现时代，所有的殖民地，情况都是如此。

巴西最初的经济开拓地区，不用说也必然是她的大西洋海岸。因为缺少可供殖民的人口，又缺

少资金去开发这块巨大的新殖民地，葡萄牙人不得不闭居在沿海岸线的一些零星据点里，即贫瘠荒芜、巴西红木^①丛生的地带中一些不固定的交易点里。后来放牧者在一端沿北方河流而行，而圣保罗的远征队队员^③在另一端，攀越高原南沿的山脉然后顺河西下，他们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完成了巴西经济开拓地区的第一次大移动。开发这片土地的过程并不象美国那样发生在政府实行控制之前。向西方推进的巴西拓荒者想靠着俘虏和奴役印第安人靠着开矿投机来追求意外的奇遇和轻易到手的财富。他们曾在广大的区域里艰苦跋涉而所有这些地方的政治疆界差不多都早已划定了。在这个殖民地的第三个世纪里黄金和钻石的发现，又引起了国内开拓地区的一次新变动。继远征队之后流动商人、探金者、小贩、骡夫和放牧人开辟了海岸与偏远内地之间的交通和

巴西红木，为一种灌木，可以用作红色染料。一说巴西即因这种植物得名。——译者

同土著居民进行交易的地点。——译者

十七、十八世纪，那些结成武装的帮伙，在前所未知的巴西内地到处飘游，而以掠夺为目的的开拓者与冒险家，称为远征队。——英译者

贸易。

这种早已开始但尚未完成的内地占领活动，并没有影响到巴西的原始经济中心——东北地区的炎热而潮湿的甘蔗产地。葡萄牙殖民者因为不能依靠懒惰强悍的印第安人去从事一连串不可缺少的笨重田间劳动，他们便在殖民地的第一个世纪里引进了非洲奴隶。甘蔗种植园以伯南布哥和巴伊亚两地为主迅速地增加起来并且很快就变成了全国财富和文明的中心。制糖工业使一大帮傲慢而又有权势的封建主得以兴起，他们实际上是不受各省首府约束的。因此这项工业就确定了巴西社会的型式，而这种型式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方才受到城市工业文明型式的威胁。

甚至当巴西的经济中心已从北方的甘蔗种植园转移到南方的大咖啡农场的时候，由于采用了同样的生产方法，古老的宗法社会仍完整无损地保留下来其心理状态在很多方面都令人想起那种原始的氏族集体的心理状态。种植咖啡的里约热内卢省人或圣保罗人，跟伯南布哥或巴伊亚

原文为 *Fluminense*，指里约热内卢省的土著或居民。
另一词，*Carioca*，指里约城的土著或居民。——英译者

的蔗糖大王一样，都深深地依附于土地之上。而且，他们也表现出同北方人一模一样的缺点和长处，所不同的，可能是北方人的贵族派头更大一些，更奢侈一些，更没有长远打算，更不愿意离家外出，更害怕搞经济上的实验，而且在政治上也比南方那些与他地位相同的人物更加激进。

在葡萄牙政府看来，将巴西划分为无隙可乘的世袭管区〔capitanias 意为大面积的授与地〕仿佛便是保护这个地区，抵制外国人的贪欲的最好方法。英国人在北美洲采用过的、并由葡萄牙人在亚速尔群岛试验过的殖民地开拓方式，又在巴西重新运用起来。管区领主〔管区的受赐者或被赠予者〕，除了在伯南布哥省和圣维森特省以外，实际上都不起什么作用，因此，他们的权力便被国王所剥夺，而他们本人也处于巴伊亚一个总政府机构的统治之下。由于任命了总审计长，并由于被授与了向里斯本上诉的权利，巴西在创建司法机构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在巴伊亚设立的第一个上诉法院（西班牙统治期间被撤销，而当葡萄牙重新获得独立时又恢复起来），便是这方面工作的一个里程碑。纳绍一毛里茨在他对伯南布哥实行有效的统